

附錄一

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肅清左傾流毒

要想在實踐中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四個現代化的道路，這首先就需要正確地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需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的歷史，中國的社會和中國經濟的現狀。祇有正確地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才能從「文化革命」浩劫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中解脫出來，找出一條最穩妥而有效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經濟情況怎樣呢？

（一）解放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國家中領導無產階級，結成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勞動人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經過近 30 年的艱苦卓越的鬥爭和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推翻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這是我國革命的最根本的特點。

（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領導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所有制，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徹底進行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在全國實行了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實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解放以來，我國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

但我們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發展速度總的說來是緩慢的。30多年來我們確實犯過不少錯誤，特別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指導思想離開了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國有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搞飯吃。農民還以手工勞動為主，處於半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所在。

不瞭解這一點，在建設社會主義中貪多求快的思想指導下，使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兩個「馬鞍形」。這就是：1957年以前的三年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由於採取了基本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各國。1958~1962年「大躍進」、「公社化」採取了過左的作法，國民經濟大幅度下降。1963~1965年經過三年的調整，經濟又有較快的恢復和發展。1966年以後經過「文革」浩劫的大破壞，「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堵資本主義的路」，再加政治上的大動亂，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沒有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重性，又來了一次盲目的「大幹快上」，盲目引進外國技術，使我國本已失調的經濟，又遭到一次新的災難。黨的11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收到一定效果，經濟情況有所好轉，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扭轉被動局面。我們必須從這個痛苦的現實入手，總結經驗教訓。

解放以後，我們的國民經濟迅速地恢復並提前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生產關係比較適合於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當時我國的經濟是這樣的五種成分：

- 1、國營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
- 2、合作社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
- 3、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 4、個體農戶和獨立小工商業者經濟；

5、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

這個時期各種經濟成分的比重和發展速度如下表：

年 份	工 業			商 業			備 註
	國營	公私合營	私營	國營	公私合營	私營	
1949年	34.7%	2%	63.3%	14.9%		85.1%	商業為1950年
1952年	56%	26.9%	17.1%	42.6%	0.2%	57.2%	商業零售
1956年	67.5%	32.5%		68.3%	27.5%	4.2%	商業零售

合作化的農業成分：1954年佔2%，1955年佔14.2%，1956年佔96%。

在這種經濟結構基礎上，我國工、農業生產取得了遠較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速度為高的發展。以1952年同1949年比較，農業生產增長了48.5%，平均每年遞增14.1%；工業生產增長了145%，平均每年遞增34.8%。¹ 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明顯的改善。雖然從1956年之後我國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急了一些，快了一些，人們仍把這一時期當作我國經濟繁榮的黃金時代加以懷念。事實證明，在一個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而資本主義又發展不足的國家，以國家資本主義為發展的中間環節，不是立刻封閉和堵死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利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溶合和引導各種小生產變為大規模的生產，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正確地總結了這個時期的經濟，肯定了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提出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治路線。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這條路線能夠堅持下來，我國經濟就可能以較高的速度發展。但1958年的大躍進，背離了這條政治路線，企圖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的任務，來個大躍進一蹴而成。一個逐步，一個躍進，兩字之差，謬以千里，使我國蒸蒸日上的經濟局面受到挫折。因而造成國民

經濟比例失調，人民生活困難。這除了左傾錯誤的干擾外，還應從經濟結構的急劇改變中尋找答案。僅就商業經濟結構的改變為例：「從1958年起，許多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併入國營商業，自負盈虧的小商店，小攤販幾乎完全被消滅，使許多居民深感不便，吃飯、買菜排隊的現象愈來愈多。」² 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由於消滅了長途販運的私商，許多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的城鄉流通渠道中斷了。供銷合作社獨家經營，解決不了成千上萬種小產品的運銷問題。許多種山貨土產由於運不出來，祇能讓它爛在山上。農民減少了收入，城市減少供應。許多山區、牧區有很多種土特產品的產量，比剛解放時減少了70~80%，城市中則長期脫銷。這些地區利用當地資源製成的手工業品，也因銷售困難而停止生產。³

上述情況反映了大躍進、公社化給生產和分配帶來的混亂，證明我們違反了客觀規律，違反了列寧關於經濟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按照列寧的說法，類似俄國這樣的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國家「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後勝利，即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⁴ 列寧在批判「左派共產主義者」亂叫什麼「完全打倒」、「徹底粉碎」、「最堅決的社會化」的「胡說八道」時闡述了這一思想：

「在國有化問題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不堅決的態度。關鍵卻在於：要由國有化和沒收過渡到社會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⁵ 列寧認為既然革命是發生在如此落後的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此落後，那麼，要繼續完成由於資本主義落後而沒有完成的任務，為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補課。革命的無產階級就不得不去做某些本來應該是由資產階級去做的事情，完成某些應該是由資產階級去完成的任務，包括消滅小生產。這樣就不得不允許某些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東西存在和發展。

列寧針對當時俄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在「新經濟政策」下允許農民上繳糧食稅之後從事自由貿易，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租讓制、租借制，提倡共辦合營企業，利用小業主的合作制，促進工農之間的經濟流轉。「為了使『我們』能順利地解決我國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就必須懂得，需要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補助辦法，才能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全部關鍵就在這裡。」⁶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害怕資本主義的某些有限度的發展是「可笑的」。在一個小農國家裡，「小經濟的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貿易自由基礎上，即使祇是地方性的；也會「使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復活」。租讓制的「承租者就是資本家」；而國家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和人們通常說的相反，它是「給以一定限制的資本主義。」⁷「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殺。」⁸「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或實踐上的問題，在於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⁹

列寧還告誡我們：祇有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入口處」。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發展可以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而小業主的合作社實施的成功，「卻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群眾」，「就會使我們把小經濟發展起來，並使小經濟易於在相當期間內，在自願結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¹⁰ 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前資本主義佔優勢的國家必須經過的「同一條道路」和「同一個中間站」，「即所謂『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計算和監

督』」得以建立的「中間環節」，「是任何一個落後國家也不能跳過的發展階段」。¹¹ 我們祇有這樣做，才能找到「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¹² 反之，臆造任何共同體，幻想出任何堅決社會化的模式，以一種國營經濟成分簡單取代多種經濟成分，其結果祇能使「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制度內部」「復活起來」。列寧指出：經濟落後的，無產階級已經奪取政權的國家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其經濟根源在於：小生產者的貧困、不開化，交通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工農業間的缺乏流轉，缺乏聯繫和協作的隔絕狀態。這裡的官僚主義是「小生產者散漫性和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築。」¹³

列寧既觀察到資本主義經由前資本主義，到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也看到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新特點，它們在俄國社會中的不平衡的，多線條的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加快溶合各種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過程。並指出了這種溶合過程，即我們以上列舉說明的中介形式。正因為如此，落後國家才具備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逐步地、緩慢地過渡的經濟前提。

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的發展是按總的，一般規律進行的，但是總的一般發展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表現出變例，反而恰恰通過這樣的變例為自己的發展開闢道路。各個國家由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的起點不同，國情不同，「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固然並不越出世界發展的共同路線」，但顯然會有別於馬克思以西歐各國革命為背景的設想，「而且在轉向東方國家時這些特殊性又會帶有某些局部的東西」。¹⁴

根據列寧的上述觀點：來總結我國 30 年的革命實踐，我認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肯定的路線是正確的，符合馬列主義原理的。劉少奇同志在《政治報告》中說：「國家

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這樣的政策，工人階級又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了經濟上的聯盟，並且在這種聯盟中實現了國營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導，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¹⁵ 十分可惜的是，這條正確路線後來受到了左傾錯誤的干擾。

1955年下半年以後所謂批判「小腳女人」以及對鄧子恢同志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評，標誌著左傾錯誤的抬頭。解放初期土改之後，佔全部農戶91.2%的貧農和中農，連一張犁、一頭牲畜這樣原始的生產工具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多數農村居民無力從事獨立的個體生產，除了把剛分得土地的貧農下中農組織起來，互助合作，別無出路。王國藩三條驢腿的合作社的出現並且增產的事實標誌著土地改革之後，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進行的，落後的農業生產力要求互助合作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支持並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使農業合作化所面臨的歷史條件根本改變了，它已經不是歷史上農民自發互助合作經營的簡單再現。如果引導得法，它將成為向社會化的大生產過渡的第一個適當的環節。但是，由於沒有認識到這種合作組織與歷史上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傳統合作組織一樣，是生產資料匱乏的產物，因而在經濟上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部分的原始共同體性質。隨著經濟建設的勝利，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思想迅速膨脹並氾濫成災。他們一方面錯誤地把合作化的成績與左的冒進措施聯繫起來，用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去「發展」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否認合作化運動中我們黨所堅持的平等互利和自願原則，以為繼續強制推行公有制的高速度改造，就能提前實現共產主義；一方面又把我國農村因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系統結構變化而產生的新要求、新萌動，一概批作「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把發展商品經濟的一切前提和後果，把可以引起幾千年宗法式自然經濟解體的因素，統統加以徹底批判和排斥。

1958年大躍進、公社化，1959年反右傾，事實上標誌著這種左傾錯誤在黨和國家生活中佔據了統治地位。全國各地大刮共產風，高征購、高指標，一平二調，大煉鋼鐵，虛假浮誇之風橫行一時，使我國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破壞。1959年廬山會議，本應對這種左傾錯誤進行糾正，但卻提出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冤案，打擊了以彭德懷同志為代表的，堅持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的同志，實際上掩蓋並助長了左傾錯誤。

1962年的三年調整，雖然使工農業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由於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左傾思想，沒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抵制，經濟形勢剛剛好轉，隨之而來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30年的經驗證明了列寧的下述教導：「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把農民當作社會主義者來制定我們的社會主義計劃，那就是把這種計劃建立在沙子上。」¹⁶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祇有有了物質基礎，祇有有了技術，祇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祇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關於小農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可以說是全部心理健全起來。」¹⁷ 列寧明確地指出，沒有以上所說的物質基礎，農民就仍然保持著小業主的心理，「任何集體制、集體農莊、公社都是不能改變這種現象的」。¹⁸

任何人都不會拒絕承認，我國解放初期在經濟上比俄國落後得多。而我們卻不顧這些情況，想在幾年之內完成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解決的任務，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急於求成，從根本上違背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客觀規律。結果是欲速不達。

30年來，中國人民自己的切身經歷和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教材，使我們充分認識到左傾路線的毒害。我們必須認真地從痛苦的經驗中認清左傾錯誤的實質，它的思想根源、

社會根源和對革命的危害。

左傾錯誤的基本問題何在呢？

（一）在指導思想上脫離了當時中國落後的小農經濟佔優勢的社會情況，過早地按照主觀的社會主義的模式進行經濟上的改革和建設，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的主觀力量還不能完全擔負起組織全國經濟生活的任務和客觀的物質文化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過早地消滅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農民個體經濟。

（二）從理論觀點看來，我國實行了土地改革，取消封建主義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祇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僅僅因為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才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而在經濟基礎和科學文化發展水平上還不具備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條件。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適合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在國有經濟成分的領導下，調動個體經濟積極性的自由周轉、這就是在適當地利用小商品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列寧在分析類似情況時指出：「無論如何都要活躍工農業間的流轉。誰能在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績，即使是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法，甚至沒有經過合作社，沒有把這種資本主義直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那他給全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益處，也比那些祇是『關懷』共產主義純潔性，祇是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合作社寫規章、條文、訓令，但在實踐上卻不能推動流轉的人，要多得多。」

「這可能被認為是奇談：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嗎？」

「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無可爭辯的事實。既然這個小農國家，……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領導，那末，根據這些前提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

主義。」後來列寧又進一步指出，「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利用國家調節的全國性的商品生產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起點。」¹⁹ 在這種情況下，取消個體農民經濟的任何存在和禁絕一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就等於抑制了廣大人民中生產的積極性，堵塞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自然資源開發的許多途徑。延緩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大躍進以來在左傾思想指導下為了從農民身上進一步獲取更多的積累，盲目地搞高征購，高指標，一平二調，刮共產風和窮過渡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應運而生。這些做法都是脫離我國國情違背列寧的教導的。

（三）從實踐上看，我們從舊中國接收了全部官僚買辦資本，銀行、礦山、鐵路交通，基本掌握了和操縱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再加上各級政權的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我們完全有可能在這些物質力量的基礎上，充分調動一切社會經濟成分的積極性，迅速發展生產力，並逐步溶化改造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那種害怕資本主義、害怕兩極分化、害怕少數農民先富裕起來的思想是政治上軟弱怯懦，缺乏政治遠見的表現。多年來我們在經濟政策上的基本錯誤在於，把資本主義氾濫的可能性和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時間，一定限度內存在的客觀必要性混為一談。低估了無產階級有把握在限制和利用中改造資本主義的能力。因此，在經濟建設中，這種實質上是右傾的「恐資病」卻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上」「堵資本主義道路」、「窮過渡」等等左傾口號下表現出來。這種抱著小資產階級仇視大資產階級的病態心理的「恐資病」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過左政策的思想根源。

30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左傾錯誤集中於一點：就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用「二律背反」形而上學觀點，把兩者看成絕對不同的，非此即彼的關係。不懂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之間的辯證的歷史的聯繫。前者為後者準備經濟基礎，後者則以前者的全部物

質文化遺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因此，抹殺了從前者至後者轉變過程中應有的中間環節。

在理論上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在實踐中就會必然地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混淆起來，把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經濟上的補充物當作資本主義加以消滅，使廣大的農民長期陷入貧窮落後的半飢餓狀態。

黨的三中全會以來，認識到必須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國民經濟的正確路線，但左傾流毒的陰影卻頑強地在阻礙著這個路線方針的貫徹。為了徹底清除左傾思想的影響，最根本的關鍵是認真學習列寧關於經濟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間環節的理論。

列寧認為落後國家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警惕在這個國家將會出現的主要危險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不斷地表現出來，並一再造成反動。²⁰ 長期以來，我們在一系列基本理論上的混亂，政策上的搖擺，左傾錯誤反覆出現證明了列寧關於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措施的學說是完全正確的。雖然列寧的過渡措施學說祇是一些最初步驟，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實際進程一定會超過它們。但是這些措施本身是不可能避免或逾越的。

在俄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落後國家裡，列寧曾經試圖推行這樣一個總戰略：以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逐步增長為目標。為此就必須以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與之類似的合作制經濟的結合為發展鏈條中的特殊環節，並通過這樣的中間環節，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小農、最小農經濟的結合，即經濟上的工農聯盟。在這種經濟措施下，以個人利益的原則吸引和融合私人所有制的經濟成分逐步聯合，推動發展商品經濟的供銷合作社向生產合作社過渡，並借此建立自下而上的統計和監督。以農業提供的剩餘產品和積累的逐步增加發展所必需的科學文化事業和大工業。而大工業的發展將使整個俄國從「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跨到無

產階級所尋求的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等等的馬上。²¹ 現代化的大工業是實現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基礎。列寧預測這一過程需要幾十年時間，並且這一過程祇有和逐步把蘇維埃俄國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國家的目標結合起來才是行之有效的。列寧科學地把這一發展的整個過程稱之為新經濟政策時期。如果不帶偏見，我們就會看到這一思想像條紅線一樣集中地貫穿於列寧逝世前的最後五篇著作之中。正因為如此，列寧滿懷信心地說，蘇維埃俄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把這種社會叫作社會主義社會，是小農在居民中佔優勢而具備一些特點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以此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相區別。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曾一度使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高興萬分，他們叫囂：「布爾什維克現在將倒退到資本主義」，「本來就祇能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現在我們和布爾什維克一致了。」列寧回答說，這一切祇暴露了他們是畏首畏尾資產階級走狗和對事情的完全無知，這裡實施的一切與倒退到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恰恰相反，我們在落後的俄國找到了向發達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正確的、真正的起點，找到了千百萬小農最易接受，共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如果他們敢於跑到這裡來宣傳這種胡言亂語，我們將以槍斃來回敬他們。²²

今天，我們在認真貫徹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總結 30 多年來領導實踐生產的經驗教訓，肅清左傾錯誤的流毒中，結合中國的國情學習列寧的過渡措施，這對我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制定並實施正確方針政策是很有裨益的。

註釋：

- ¹ 參見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18~19頁。
- ² 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47~48頁。
- ³ 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48頁。
- ⁴ 《列寧選集》第3卷，第812頁。
- ⁵ 《列寧選集》第3卷，第538頁。
- ⁶ 《列寧選集》第4卷，第524頁。
- ⁷ 《列寧選集》第4卷，參見第518、627頁。
- ⁸ 《列寧選集》第4卷，第519頁。
- ⁹ 《列寧選集》第4卷，第519頁。
- ¹⁰ 《列寧選集》第4卷，第523頁。
- ¹¹ 《列寧選集》第4卷，參見第509頁。
- ¹² 《列寧選集》第4卷，第682頁。
- ¹³ 《列寧選集》第4卷，參見第526~527頁。
- ¹⁴ 《列寧選集》第4卷，參見第690頁。
- ¹⁵ 《中國共產黨第8次代表大會文獻》第21頁。
- ¹⁶ 《列寧選集》第4卷，第387~388頁。
- ¹⁷ 《列寧全集》第32卷，第205頁。
- ¹⁸ 《列寧選集》第4卷，第491頁。
- ¹⁹ 《列寧選集》第4卷，第528~529頁。
- ²⁰ 參見列寧：〈論中國的民粹派和民主派〉、〈兩種烏托邦〉。
- ²¹ 《列寧全集》第33卷，參見第455頁。
- ²² 《列寧全集》第33卷，參見第248頁。